

中国的崛起

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

「美」威廉·奥弗霍尔特 著

达洲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THE RISE OF CHINA THE RISE OF CHINA

94938

F12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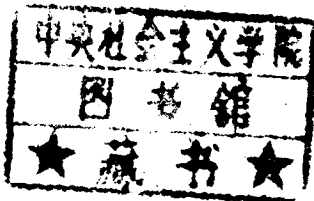
中国的崛起

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
一个新的超级强国

[美] 威廉·奥弗霍尔特 著
达 洲 译



DZ75/25



中央编译出版社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经美国诺顿出版公司与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
本社享有该书全球中文本专有出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
/（美）奥弗霍尔特（Overholt, W.）著；达洲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4

书名原文：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ISBN 7—80109—071—3

I. 中… II. ①奥…②达…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596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46 千字 印张：10.375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3.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出版前言

去年春夏之交，达洲先生来编辑部推荐一本论述中国改革的书，它就是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的崛起》。醒目的书名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崛起的中国是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全中国人民心底由衷的期望。读毕掩卷，我们决定把它介绍给国内读者。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宏大的改革计划。自那时起，中国的改革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也是自那时起，关于中国的改革和这场改革的前途，无论是在政治家那里还是在学者圈内，也一直是见仁见智，各持一说。威廉·奥弗霍尔特博士在这部书中，向读者叙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造就一个新的强国。他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推断告诉读者，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

本书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广泛注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西方占压倒优势的看法，是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那种剧烈的转变是唯一可行的改革之途，并对那种剧变大加褒赞。而奥弗霍尔特博士在把前苏联和东欧与中国加以比较之后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这种成功的改革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无疑会是促进地区性稳定和 world 稳定的积极因素。

当然，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诸多困难，对此，奥弗霍尔特博士采取的是认真分析的态度。他的论述没有那

种囿于偏见的反华言辞，没有那种霸气十足的责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西方某些政界、学界人士，敌视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梦想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同苏联一样垮台，处心积虑地想压垮和捏死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或者千方百计地要使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奥弗霍尔特博士虽然与这些西方人士不同，但是他也并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也维护美国的利益，维护西方的价值观、自由观、民主观和人权观，维护资本主义。由此，他的论述，无论在事实的认定上还是在推论前提的选定上，在一些措词用语上，都有我们认为不妥当之处；他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我们认为错误的，是我们所不能同意和接受的。我们坚持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无可比拟地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因为它恰恰是从对资本主义现实和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观的批判中产生的，它追求高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民主自由，追求大多数人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自由，追求人类摆脱自然界对人的统治和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而获得自由。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沿着这一道路走，一个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定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认为对西方学者探讨我国的改革，应持欢迎的态度，只要他们不是置身于反华的立场；我们也并不强求他们采取与我们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们只对书中个别地方作了删节，本书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希望读者能以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本书。

谢 辞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了保罗·克赖斯伯格、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弗朗西斯·莱、乔伊斯·卡尔格伦、尼古拉斯·拉迪、保罗·布雷肯、克里斯托弗·格雷、罗伯特·西伦、威廉·阿谢尔、埃兹拉·沃格尔、盖奇·麦卡菲、文森特·罗、枝灵·林（音）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指导和批评指正。虽然我对于我所援引的最重要的一些资料勤加脚注，我还是无法对所有有关人士表示我充分的谢意。事实上，香港某些人士的想法，我或者未加引用或者以某种方式滥用了，在此我一并致歉。尽管我设法把我援引的资料出处告诉读者，但仍难免有疏漏失察之处。如果仍有什么疏漏不当之处，谨由我本人负责。事实上，我特别感谢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同意我意见的许多人，包括立法局官守议员，十分出名的陆恭蕙，是他正式提出最初的彭定康法案，还有盖奇·麦卡菲。我对他们两位都十分尊敬。

我还从参加几个组织的会议中受益匪浅。这些组织包括岭南大学、青年董事长组织（the 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美国商会、香港工商专业联合会、“展望 2047 年”，以及各种基金会和经济学家的一些专业团体。

1992 年夏秋短期为我工作的瓦尼萨·金在研究方面帮了我大忙，帮助我收集资料、核对事实以及故意提出反面意见以助思

考。在研究的后期阶段，托姆·宋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帮助我收集和核对关键性的资料。

我并未像撰写学术论文那样对有关文献资料做详尽的了解，因此，可能会发生对别人所发表的类似观点我未予以指出的情况。尼古拉斯·拉迪曾向我指出，苏珊·舍克和宋云温（音）曾对邓小平建立联合政府和香港与中国的联系作过研究，他们的观点即与我的看法相似。或许还有其他此类情况。

本书还利用了以下我先前发表的文章：

《全球政治评估》上发表的有关各类问题的文章。《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年6月27日发表的文章《邓，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或许会获得荣誉》。此文是我此前5个月为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消费者们撰写的一篇文章压缩而成。政治科学院1991年的项目，由弗兰克·马基亚罗拉和罗伯特·奥克斯南编纂的《中国和东亚：对美国政策的意义》一书中的《香港和中国：实际问题》一文。该文原本是香港美国商会主持的1990年8月30日的一次演讲。1991年5月29日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洲太平洋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作证，题为《中国和最惠国待遇》。《国际经济》双月刊（1991年7—8月）上发表的文章《分裂的中国》。《当代历史》杂志（1991年9月）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与英属香港》。夏尔·埃尔武埃编纂的《亚洲—太平洋：合作与冲突的新天地》一书（魁北克：拉瓦勒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收录的《九十年代的联合国与亚洲》一文。为亚洲协会1991年12月18—19日发起在纽约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日美会议提供的论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1992年4月2日就确定美国1997年7月1日后对香港政策的S.1731号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的作证，题为《美国与香港的关系》，以及《政治学杂志》第53卷第2期（1991年5月）上发表的文章《天安门广场事

件和香港的客观可能性》。

本书无意替代或者充当标准的范文。本书提供的是诠释性的概述，而不是事实性新知识。对于那些并非这一领域内的专家，而又愿求得基本知识的人，我愿推荐以下这些书。中国历史方面，有费正清的著作（特别是《中国：新的历史》）或者乔纳森·斯彭斯的《探究当代中国》。鲍大可关于革命胜利初期的书，也不能不看。关于中国社会，没有一本书的深度堪与埃兹拉·沃格尔的《中国向前迈进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相媲美。带有较多个人色彩的书，请看张戎的《野天鹅：中国的三个女儿》。至于当代中国政治，最有意思的是李侃如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撰写的文章。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则请看何汉理的《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至于主要领导人的生平，请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时代和邓时代的中国》。关于当代香港的力作还有待于写出。在许多方面，对这块英属殖民地最有用的描述不是学术著作，而是詹姆斯·克拉维尔受人欢迎的小说，亦即《大班》（洞察这块殖民地是如何运转的两部著作中，这一部要好得多）以及《高贵的房子》。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以致对它的学术研究只能是零散的。尼古拉斯·拉迪和德怀特·珀金斯的文章已证明是具有独到的洞察力的。最全面的一批见解出现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难题》（1991年4月）中。

序

埃兹拉·沃格尔 哈佛大学
亨利·福特二世 社会科学教授

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骤然间垮台了，经济则“迅疾”开放了。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它们以蛇行的速度重新进入世界经济。在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垮台，经济呢，不是“迅疾”，而是一步步地在改造。但是，中国的经济却像野火一样迅猛地增长，已经顺利地纳入世界经济。威廉·奥弗霍尔特为这一似非而是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中国的成功令人惊愕。世界上最大的落后经济几年来以接近于南朝鲜的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南朝鲜只有4000万人。中国的人口差不多等于南朝鲜的30倍。奥弗霍尔特大胆地阐明了这样一种规模的增长可能产生的某些后果。

诚如他所指出的，中国的成功如此引人注目，是同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经济上的失败对比的结果。许多西方人，首先是美国人为东欧和苏联推翻共产主义政权而感到激动，而对中共政权在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居然保存下来而感到厌恶。然而，许多熟悉东欧近来事态发展的有见地的中国人，对于他们生活在中国而感到庆幸。

在欧洲，人民推翻了未能实现过渡、未能向他们提供较好的生活方式的共产党。在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比较迅速和大胆地实行了使他们的人民经济上得到改善的经济改革。因此，中越两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实行奥弗霍尔特如此清晰地描绘的东亚发展模式而在变革中生存下来。

中国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通过香港，通过发展新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工农业产品市场这个媒介才取得的。奥弗霍尔特以一种清新有力的声音展示了这种发展。中国的成功现在向世界提出了新问题。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内部消费，致使它在世界上还不能发挥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相应的经济作用。但是，中国人正开始考虑这种新增长的政治后果，考虑如何花不多的钱从前苏联购买军备，以使他们的军事力量现代化。

其他国家知道，中国的技术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它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现代国家，它的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许多官员以权谋私。但是，其他国家不能不认真看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它们也正开始考虑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影响。东亚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因此，东亚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势必将更大。而在东亚范围内，大中华（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正扩大它的影响。奥弗霍尔特帮助我们透彻地考虑这些后果。

威廉·奥弗霍尔特为了讲这番故事，作了独一无二的准备。他上过高等学府，学过社会科学理论和经济学，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70年代，他在赫德森研究所工作，师从思想库的杰出建设者之一赫尔曼·卡恩。卡恩从经济学、技术和文化的角度看待真理，敢于面对后果，而不论这些后果向常规的思维提出了多大的挑战。作为一名战略计划人员，奥弗霍尔特找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在那里，他跟卡恩一起改进他们的战略计划和长

期预测工作的方法。他们毫不迟疑地向无法用数量来表达的政治和心理学的大问题发起进攻。奥弗霍尔特在跟赫尔曼·卡恩一起工作的同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后来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教授一道工作。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杂志，叫做《全球政治评估》。

奥弗霍尔特于1980年加入银行家信托公司，领导一个评估全球政治风险的部门。1985年，银行家信托公司把他派往香港，香港就成了他到世界各地旅行的基地。在那里，他考虑的不光是国家的风险，还有公司的战略。香港使他获得了一个极为有利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及其邻国。

就其个人角色而言，奥弗霍尔特是一位致力于人权和军备控制问题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南朝鲜人一起致力于确保金大中不被处决。当科丽·阿基诺为政治生存而同费迪南德·马科斯斗争的时候，他曾为她效劳。他曾积极反对缅甸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读者看到的奥弗霍尔特不是政界斗士，而是作为冷静的财政和政治分析家的奥弗霍尔特。他保持了赫尔曼·卡恩的传统，展示事实并思考重大的问题。结果是形成一份大胆而又细致入微的开创性的研究报告，极大地冲破了常规的思考。

我希望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会考虑这些事实的意义。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只能寄希望于克林顿政府能足够地控制住美国国内的经济，使它能对中国新的崛起作出回应。作为唯一的全球性军事强国，美国必须参与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克林顿政府需要同中国、日本以及它们的邻国一起致力于避免军备竞赛，为把这个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结起来，使亚洲在迅速改变的全球政治结构中占据一个荣耀位置的地区秩序奠定基础。我们大家都为奥弗霍尔特如此清楚和有力地阐释了这些问题而感谢他。

目 录

1	谢 辞
1	序
1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崛起
51	第二章 经济起飞的政治学
93	第三章 资本市场的出现
122	第四章 香港和广东的黄金时代
174	第五章 香港过渡的外交
224	第六章 国际关系的变化
266	第七章 美国和中国
308	作者后记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崛起

突然，党政不同部门以及意识形态学校的干部以1949年以来没有先例的专注精神，倾全力大笔挣钱。

中国报纸报道说，20万党员下海了，成了“红色资本家”。中国各地的军队单位，包括军工厂、港口、航空港和运输部门，与民间的公司和外国的公司签订了办合资企业的合同。

上周，据说某省委党校倡议同香港一家商行签订合作生产竹子工艺品的协议……

香港商人说，党内元老的子女们正放弃从政，而代之以用关系换大钱这种比较安全可靠，又有利可图得多的行当……

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中国老百姓也掀起了快快发财的狂热。他们正把全民皆商付诸实施。

——引自《南华早报》1992年8月5日所载威利·沃-拉普·拉姆的文章《邓挑起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财情绪》

在过去两千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站在世界技术和收入的顶端。诚然，中国曾是如此强大，致使它的人民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中央王国，是一切围绕着它转的中心。但是，过

去两个世纪里，中国人经历了外弱内散的岁月，人民生活在不堪言状的贫困之中。

一直到 80 年代初，有 1 亿多中国人仅靠比在纽约吃一顿像样的饭还要少的年收入维持生计。即令今天，还有大约 4000 万人生活在东北*的窑洞里，中国 1903 个县中有 520 个县的人民年收入低于人均 35 美元。这样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况造成了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一家一条裤子的现象。一条裤子的家庭在中国十分广泛，这是指只有足够的衣服供一名家庭成员穿用的家庭。中国的社会学家曾对此作过研究，但研究的结果从未在西方发表。值得注意的是，男人白天要穿上裤子到地里干活，女人只好躲避起来，女人到晚上才穿上裤子。另一种做法是，村民由于太穷，没有衣服穿，就用焦炭把自己涂黑，给人穿上了黑衣裳的错觉。^①

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成为过去的事情。随着执行邓小平 1979 年经济改革计划而开始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正以以往仅限于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速度，消灭这样的贫困。事实上，这一中国现象在历史上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在 80 年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增长得最快。在 80 年代后期经过短暂的反通货膨胀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于 1992 年又再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以前，这一类的成绩似乎局限于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只有 600 万人的香港、200 万人的新加坡和 2000 万人的台湾）或者人口构成极其统一的国家（南朝鲜和日本），或者人口不多的经历暂时的商品繁荣的国家（70 年代时的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取得这一成就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占世界人口 1/5 且经济极其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增长的。

中国的经济繁荣正在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例如，1991 至

* 原文如此，疑为“西北”之误。——译者注

1992年，正当美国和日本经历严重的衰退时，中国的繁荣刺激香港相应地繁荣，并使台湾迅速而成功地作了调整。中国沿海地区的成功和正在出现的高生产率将向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提出严重的挑战，它们现在要么加快自己的改革计划，要么在竞争力更强的中国人面前失去贸易和外国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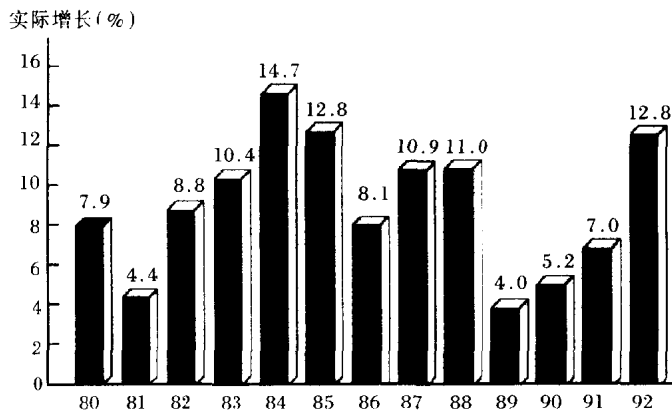
中国的经济繁荣还产生了其他后果。这一繁荣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并有希望令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改观。经济上的成就使改革派掌握主动权。它使沿海地区掌握了压倒内地（包括北京）的主动权，并在一个革命后始终以“政治是统帅”为中心口号的国家里，使经济压倒了政治。它还使中央放松了对各省、国有企业、地方和部门经济活动的控制，首先是放松了对个人的控制。它还使中国广泛地展现在外界面前，以致在沿海地区、许多大城市以及实际上在所有的大学和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它还至少使四代人（80多岁的领导层，65岁左右的一代人，50岁的一代人以及45岁以下的一代人）的观点产生了惊人的分歧，而每一代人都决心更快地实行改革。

在国际上，中国闭口不谈它的一切冲突和地缘政治野心，以追求经济上的成就。它已停止推进海外的革命，与所有邻国修好，把军费降到很低的水平，把军队裁减了将近100万人，实际上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展开贸易，向北朝鲜施加压力，以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同它所有原先的敌人，包括南朝鲜在内，建立了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经济成就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服务的。这一目标现在达到了。在改革开始后,中国的增长迅速提高到10%的年率。^②1988和1989年为了处理高得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而作的努力,引起了速度的短暂下降,降到了4%,这个速度西方国家也仍然会认为是繁荣。1991年再次上升到7%(近年来,作为一个集团,亚洲国家的奇迹经济都达到了这一水平),而在1992年,又提高到12.8%。1992年,北京规定今后5年的目标是年增长8—9%。在不发生令人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个增长速度能否保持,尚需拭目以待,但是,中国增长7%以上的能力看来是可靠地

图 1-1 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 改革后的中国



来源: 国家统计局。

确立了。

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局限于原始经济增长。1992年，外贸额上升到1660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已摆脱自给自足状态，成了世界主要贸易国之一。出口从1979年的148亿美元猛增到1992年的850亿美元^③。不仅出口额增加了，出口产品也变得更先进了。1985年，制成品只占中国出口的一半，而1991年，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的3/4以上。^④中国在出口增长的同时，近来贸易有大量顺差。

中国在前10余年的改革中吸引了200多亿美元^⑤的外国投资，包括30000多家企业，比第三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得多。作为比较，从1985至1989年，第三世界国家中唯一幅员可与中国相比的巴西吸引了61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而中国吸引了91亿美元。^⑥仅1992年一年，外国投资者向中国投入了112亿美元，并签署了575亿美元的未来投资协议。1991年年底，37215家外资企业生产了120.5亿美元的出口物资，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7%弱。仅1992年一年，政府又批准了47000个外资项目。^⑦在这样一些数字成为现实之前，严肃的经济学家不大会认为是可能的。

通货膨胀虽然不时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最高只及南朝鲜70年代后期所达到的水平的一半，只相当波兰和前苏联的1%。

成功的基础：中国相对于苏联

中国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的差异来源于两国深为不同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大多数西方人相信这样一个神话：中国不过是贫困的前苏联的翻版而已，中国将不可抗拒地步苏联失败的后尘，原